

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▶ 《論語》文本之辭氣分析

doi:10.7013/CCTHCWHSNK.200512.0029

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, (7), 2005

作者/Author： 高大威

頁數/Page： 29-43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：2005/12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<http://dx.doi.org/10.7013/CCTHCWHSNK.200512.0029>



DOI Enhanced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（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）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《論語》文本之辭氣分析

高大威

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

論文摘要

現代學者解讀《論語》時，因著重於其中之思想分析，故多游心於文字符號之顯義，於辭氣則多所忽略。由於語境、文字訓練以及態度之異，傳統學者解讀文本之際，其體會往往兼及辭氣，而對文本之掌握較為精詳，並時而牽動對文本蘊義之理解。民國以來，詮解《論語》而措意及此者，乃以錢穆為代表，今則呈式微之勢。本文即透過實例以闡明辭氣分析對理解《論語》文本之影響。

欲通《論語》義理，必須先通《論語》之文法。

若文法不通，所講的義理，只是你自己的，

不和《論語》本文相關。

～錢穆²

1 本文蒙《中文學術年刊》兩位匿名審查人惠予若干建議，特此致謝。今有據之而逕改於正文者，亦有補陳於註腳者。

一、跨處於考據與義理之間

中國之經典詮釋於漢代儒學中即已確立兩種走向，用後世之概念言，一為訓詁走向，一是義理走向。二者並非全無交集，如：今文學派，尤其闡揚《春秋》所謂之「微言大義」者，其於經典蘊旨之發揮，仍從經典用字出發，由語意推向大義；至於重視實事求是之古文學派，固致力於訓詁及相關考證，唯仍往往將文本之根本指向置入禮之觀念架構，毛《詩》、鄭《箋》即其顯例。兩種走向之交集固然存在，詮釋進路及側重所在畢竟有別。

清代乾嘉學者普遍有所謂「讀書必先識字」、「訓詁明而義理明」之觀念，其於經典詮釋之徵實面向亦有可觀成績，但「識字」究不等於「讀書」，「訓詁」亦僅屬「義理明」之必要條件，並非充分必要條件。確切掌握文本字面義，進而據以尋繹文本之深層旨義，仍為經典詮釋之正法。考按古今經典註解形式，亦多半先解字面，再據以推求底蘊，其不同處，多見於兩者間辯證之詳略、深淺而已。

中國悠久之經典詮釋傳統中有一特殊現象，即：相對而言，傳統學者較重視「辭氣」³，此所謂「辭氣」相當於今日「語氣」一詞，多指涉發語者表述意見時之情意面向，藉之，讀者可掌握其意之輕重或其肯定、懷疑，此外，其並牽及發語者之語意。反觀現代學者，往往重視思想爬梳，於辭氣部分則較為忽略。

探討經典文本之辭氣，有兩點須先行考究：一、古代之記錄多出以後世所謂文言者，文言乃極濃縮之書面語，用字精簡，其既非逕以口語逐字記錄，則發語之際，其辭氣之原始風貌何由而見？或出於書寫習慣，或因書寫工具之限制⁴，愈古之文本，用字確實愈為精簡，而文字愈精簡，則其辭氣之原始風貌流失愈多，但亦非全無可見，以《論語》為例：

2 錢穆：《孔子與論語》（臺北：素書樓文教基金會、蘭臺網路出版商務股份有限公司，2000），頁51。

3 「辭氣」一詞最早見於《論語》，其載有曾子言：「出辭氣，斯遠鄙倍矣。」（《泰伯》，頁70）依朱熹之解，「辭」指言語，「氣」謂聲氣，見朱熹集注，徐德明校點：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收錄於朱杰人、嚴佐之、劉永翔主編：《朱子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2），第6冊，頁139。

4 其刻諸甲骨、鑄於金石者固非易為，即著於竹帛，受限亦大，然於紙張發明與普遍使用之前，精簡、濃縮之文言業已成熟而為通行之體式，歷代雖見變衍，究與口語相距頗遠。「口語」與「書面語」固然異時異地皆見，為書面語並不同於「文言」，以現代漢語之書面語論之，其屬「語體文」而非「文言文」，即可證知。職是之故，本文特謂文言為「極濃縮之書面語」。

子禽問於子貢曰：「夫子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，求之與？抑與之與？」

子貢曰：「夫子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！」（〈學而〉，頁7）

此段文字在不失原義之要求下，可改記如：「子禽問曰：『夫子至是邦，必聞其政，求之抑與之？』子貢曰：『夫子求以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，異諸人也。』」如此改動，並未乖離原旨，其間不同，即在辭氣⁵，藉文本不同之辭氣表現，讀者所致印象自隨而不同，文言用字雖少，仍無妨窺知。復次，辭氣寄存於各文本，而對話式文本中之辭氣尤值注意，因對話與獨語不同，對話乃在公開、人際互動狀況下進行，情境及發語對象直接影響及唇吻間之辭氣。

傳統學者之重視辭氣乃追源於文言讀寫之基本訓練，其蓋於啓蒙之時即透過閱讀、記誦、書寫之實踐而習得辭氣之體會與訓練。現代語體文亦有辭氣，其雖未必皆如黃遵憲所云「我手寫我口」，但手與口間之距離確實相近，於閱讀與書寫時，較不講究反覆沉吟，無論求一字之安或文句之暢。置身之語境不同，對辭氣之敏感程度自然有異。此外，對現代人文學者而言，除非進行作品之文學或語法分析，否則，關注所在乃集中於文字背後之抽象概念、思想以及意義詮釋，而辭氣於文本居於次要、潛隱之地位，故閱讀古代文本之際，學者或全無辭氣意識，或有所感應而認為無關宏旨，乃置之不論。此對解讀用字精審之古文而言，確屬缺憾，於人文範疇，中國古來持有之認識論多屬情理式，兼攝主觀之情與客觀之理，此一取徑方式迥異於純理思維，是故傳統之於經典文本極重視所謂「體會」、「玩味」、「涵泳」，此類詞語皆觸及了讀者之親身實感——此以杜維明之說法，屬於「體知」⁶。既屬體知，則面對文本時，透過其中辭氣之輔助以解讀文本，所得印象必更為完整，對語意性質、輕重亦更能準確掌握。

《論語》乃中國傳統之重要經典，其文本具有對話性質，於書寫較為不便之先秦時期，文字固精簡，卻不乏表現辭氣之字眼。本文因以《論語》為例，探討辭氣與文本理解、詮釋之問題。

5 此例輾轉承於胡適之啓發，家父早年往聽胡適演講，據謂：胡適曾舉此章表示古代書寫不便，記言簡略，然大量使用虛字，足見其忠實反映子貢表達意見時自然流露之語氣。

6 杜維明著，郭齊勇、鄭文龍編：《杜維明文集》（武漢：武漢出版社，2002），第5卷，頁329-376。

二、《論語》辭氣諸家體會之異同

考察傳統有關《論語》之注解，重視辭氣，古已有之，第特別關注於此者，明顯起自於宋代理學家。宋之前，可舉二例，其一針對《論語·憲問》而發，茲先錄其原文：

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：「信乎夫子不言、不笑、不取乎？」公明賈對曰：「以告者過也。夫子時然後言，人不厭其言；樂然後笑，人不厭其笑；義然後取，人不厭其取。」子曰：「其然，豈其然乎？」（〈憲問〉，頁125）

章末，孔子「其然，豈其然乎」一語，《論語集解》引東漢馬融之說，云：

美其得道，嫌其不能悉然也。⁷

而皇侃《論語義疏》引袁喬之說，曰：

「其然」，然，之也。此其善之者，恐其不能，故設疑辭。⁸

依孔子原文，其繫一「乎」字，屬疑問口吻，至為明確，馬融、袁喬之說大致相同，細微之異在於馬融用一「嫌」字，語氣較重，而其體會乃在孔子以公叔文子之行恐非「完全」（悉然）與公明賈所說相等，袁喬但言「恐其不能，故設疑辭」，指孔子以公明賈所云，公叔文子實所不及，故藉疑問方式回應。宜措意者：馬融「美其得道」與袁喬「此其善之者」之語，皆針對前一「其然」而闡，亦即該章前一「其然」語帶肯定，後一「其然」乃表示疑問。試參朱熹之解，其云：

文子雖賢，疑未及此，但君子與人為善，不欲正言其非也。故曰「其然豈其然乎」，蓋疑之也。⁹

自朱熹「與人為善」一語，可知其體會大致與馬融、袁喬同，錢穆於《論語新解》云：

7 曾秀景：《論語古注輯考》（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91年），頁389。

8 曾秀景：《論語古注輯考》，頁390。

9 朱熹：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211。

其然，美其能然。豈其然，疑其不能誠然。¹⁰

此段話語亦本於同一傳統之理解，二語尤簡明扼要。若參考現代學者李澤厚之解，即可發現態度顯然有別，其云：

大概表示孔子懷疑如此吧。這章沒有什麼特殊意思，《論語》中這種無意義的章節有好些，不必句句認真，章章強解。¹¹

顯然，李澤厚之態度迥異於傳統學者，對其而言，閱讀《論語》似應關注於「特殊意思」，此即現代學者偏重知識進路之閱讀策略¹²。其間差別在於傳統學者對待原文極認真，字句推敲極細密，即使未必全然正確，態度則甚為謹慎，故初步解讀時，多不如此大而化之，此與現代新批評一派所謂之「細讀」（closed reading，亦有譯為「精讀」者）頗有相契之處。再者，從經典文本之「顯義」論，此章或無深旨，唯就其「隱義」言之，則孔子所關懷以及如何措詞回應，正可增進讀者對孔子之完整瞭解，非無意義。

又如《論語·陽貨》云：

子之武城，聞弦歌之聲。夫子莞爾而笑曰：「割雞焉用牛刀？」子游對曰：「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：『君子學道則愛人；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』」子曰：「二三子！偃之言是也。前言戲之耳。」（〈陽貨〉，頁154）

「前言戲之耳」，皇侃《論語義疏》引繆播說，云：

其不知者，以為戲也；其知之者，以為聖賢之謙意也。¹³

繆播之說固在注解「前言戲之耳」一語，然已無與於訓詁，乃透過辭氣想像而

10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（臺北：素書樓文教基金會、蘭臺網路出版商務股份有限公司，2000），頁413。

11 李澤厚：《論語今讀》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04），頁386-387。

12 本文匿名審查意見云：「文中所學當代學者——李澤厚，似乎代表性稍嫌不足。」按：該審查人措語含蓄而謹慎，既謂「似乎」，且云「稍嫌」，而未明示其理由以及足可取代之學者。筆者重加思之，以為李澤厚於相關領域固非現代學者唯一代表，然視其為代表之一，則無不當。因審查人之質疑，茲補述本文所謂「現代」之義，其乃相當於英文modern之概念，其除具「現今」之時間意涵外，並指涉與「傳統」（traditional）相對之精神走向，準此，現今學者若以傳統精神為其指歸而類乎文化遺民者，仍可目為傳統學者（此「傳統」、「現代」之相對概念並未預設價值優劣，其間亦未可截然二分）。李澤厚既將《論語》全書各篇章逐一析解，而又多出以現代哲學思理，則本文以為取樣，或無失當。

13 曾秀景：《論語古注輯考》，頁438。

推其語意實指，依其說，則「前言戲之耳」為表面措辭，孔子如此表示，乃緣於自謙，猶然以子游無須小題大作，故應之云云。朱熹之解不同，其曰：

嘉子游之篤信，又以解門人之惑也。

又謂：

治有大小，而其治之必用禮樂，則其為道一也。但眾人多不能用，而子游獨行之。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，因反其言以戲之。而子游以正對，故復是其言，而自實其戲也。¹⁴

朱熹「篤信」之理解，把握甚為深刻，其言「嘉」、「深喜之」，則是以孔子認可子游之態度。錢穆之說與朱注同，其云：

戲言蓋出於嘉喜之情。

並列出「割雞焉用牛刀」之二解，而加以辨證：

一言其治小邑，何必用禮樂大道。其實則深喜之。一言子游之才而用於武城之小邑，則是深惜之也。然承上「莞爾而笑」，則終是喜深於惜。¹⁵

錢穆自孔子辭氣以上貫文意，「莞爾而笑」確有小題大作之意，唯並不以弦歌武城為非，「嘉喜之情」正意味肯定。李澤厚之說則又不然，其云：

其實孔子並非開玩笑，割雞本不必牛刀，小官又何須大作。但孔子又不好認真如此說，當時神態似可見。¹⁶

此說與繆播之解近，然依此理解，孔子應逕對子游一人言，其大聲謂眾弟子：「二三子！偃之言是也。」似乎悖情。由辭氣而貫連「莞爾而笑」、「二三子！偃之言是也」之文意，可知朱熹、錢穆之解較勝。

至於宋儒始提出有關辭氣之解說，此亦舉二例，其一於《論語》原文為：

有子曰：「其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鮮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亂者，

14 以上所引均見朱熹：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247。

15 以上所引均見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，頁508。

16 李澤厚：《論語今讀》，頁473。

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！」（〈學而〉，頁5）

朱熹注末一字云：

與者，疑辭，謙退不敢質言也。¹⁷

該「與」字通「歟」，語末助詞，表疑問，其意明顯，故歷來注家多不特別說明，當無異議，朱熹此注，則在申明有若之辭氣——表有子一己之想法，但未敢必謂其是。據此，可窺其解義之細膩。同書另一例，後世有不同之見解，原文為：

子夏曰：「賢賢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，與朋友交言而有信；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」（〈學而〉，頁7）

朱熹引吳棫之說，曰：

子夏之言，其意善矣。然辭氣之間，抑揚太過，其流之弊，將或至於廢學。必若上章夫子之言，然後為無弊也。¹⁸

吳棫所謂「辭氣之間，抑揚太過」，指子夏「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」之語；「或至於廢學」云云，當是顧慮偏尊德性所可能衍生之弊端。其提及「上章夫子之言」，全文為「子曰：『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眾，而親仁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』」（〈學而〉，頁7）兩章意致頗近，皆置倫理實踐於知識技藝等學習之上，相異處在於孔子之言緩和，而有若之言絕決。吳棫以辭氣析之，亦見其體察之精。錢穆對此則有另番意見，其云：

或謂此章語氣輕重太過，其弊將至於廢學。然孔門論學，本以成德為重，後人分德行與學問而二之，則失此二章之義矣。¹⁹

此顯然針對吳棫之說而發。今將孔子及有若之言比而審視，辭氣輕重之間，確如吳棫所陳，而憂廢學之弊，於理並非無據。然錢穆之解亦非妄下，詳而考之，

17 朱熹：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62。

18 朱熹：《四書章句集注》引，頁64-65。

19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，頁12。

二者之差異乃源自其前「雖曰未學」一語，依吳棫理解，似指子夏之陳述，白話可譯為：「即使說不曾學習」，同語之於錢穆則認為乃其人自道，錢穆云：「其人或自謙未學，我必謂之既學矣。」據此，白話當譯成：「縱使他自謙說未經學問」²⁰，由於其人自謙「未學」，子夏嘉許，故以「必謂之學矣」之肯定口吻回應。可見二說之分乃肇於「雖曰未學」究竟發諸誰口，前語之言者既殊，於後語之辭氣體會遂而有別。因知辭氣有若訓詁，其所據不同，個人之理解遂現分歧。

三、錢穆於《論語》辭氣之掌握

民國以後，注解《論語》眾家之中，以錢穆《論語新解》一書於辭氣之掌握用力最深，其細密程度或超越朱熹，唯不預懸形上性理以為訓解²¹，茲舉例如下：

（一）字詞之辭氣

《論語》載云：

陳成子弑簡公，孔子沐浴而朝，告於哀公曰：「陳恒弑其君，請討之。」公曰：「告夫三子。」孔子曰：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君曰『告夫三子』者。」之三子告，不可。孔子曰：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」（〈憲問〉，頁127-128）

錢穆書中有一極精微之注解，即：「告夫三子者」之「者」字，其云：

增一「者」字，無限憤慨，盡在此一字見矣。²²

此「者」字不見他家發揮，而為錢穆所強調，其即從「者」字背後之辭氣細察，可據體孔子於魯君不能自命三家而使己以告之意態。

又，《論語》載：

20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，頁12。

21 本文匿名審查人云：「辭氣之討論正在聲音、口氣、情態之間，與文義內涵涉不涉形上性理似無必然關係。」此說，筆者概表同意，唯文中「唯不預懸形上性理以為訓解」云云，並無以「辭氣」、「性理」二者為相斥之意，僅單純指陳朱熹、錢穆於《論語》註解之顯別所在。

22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，頁422。

哀公問於有若曰：「年饑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」有若對曰：「盍徹乎？」曰：「二，吾猶不足，如之何其徹也？」對曰：「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？」（〈顏淵〉，頁107）

錢穆於此云：

「孰與」之問，甚有深義。孔子曰：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。」²³

依錢穆引文，「孰與」及「誰與」，相當今語之「和誰」、「同誰」、「跟誰」。《論語》此章，就文法言，「孰與」可替換為「孰」或「何」，唯語意有所移轉，而未若「孰與」深刻，「孰與」於此，有君主與百姓一體而以百姓為本之蘊，此所以錢穆特為點出，並謂「甚有深義」。

此例亦有關涉版本者，茲舉二例，《論語》云：

子貢曰：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（〈公冶長〉，頁43）

錢穆云：

本章「不可得而聞也」下，或本有「已矣」兩字，是子貢深歎其不可聞。

24

按之今見版本，該句有三作：其一、「不可得而聞也」；其二、「不可得而聞也已」；其三、「不可得而聞也已矣」，錢穆之言有「已矣」者，見諸古本、皇本、唐本、津藩本、正平本²⁵。此三者之異唯在語尾助詞，換言之，僅有語氣之差異。若究其實，何本為是，實難確定。若脫離歷史而獨就該章情境論，則藉錢穆之說，讀者更易契應於子貢遺憾之意²⁶。

23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，頁355。

24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，頁137。

25 參王素編著：《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1），頁50。

26 按：此非錢穆之獨見，本文匿名審查人即舉程樹德《論語集釋》之云「故以『已矣』傳言外微旨，二字似不可脫」，審查人所陳者是，謹補按於此。復可說明二事：一、錢穆《論語新解》之作，本即取參眾解而斟酌其間，並為之折衷而問下己意，其書兼有述、作，其解義因非全然獨創者，由其或依或違，亦正可窺錢氏於《論語》之持見；二、依筆者寓目一隅所得，錢穆之撰《論語新解》，必佐資程樹德《論語集釋》一書，蓋因程著具彙解性質，羅列頗富，頗便取參，此狀況於本文不及一一詳陳，嘗建議研究生將二書逐一比對，以為徵考。唯其於前修時賢之意見或採或否，則無礙其冶為一爐，古來類此之例甚

又，《論語》云：

子曰：「甚矣，吾衰也！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！」（〈述而〉，頁60）

錢穆云：

或本無復字，然有此字，感慨更深。²⁷

有「復」字者，如：《論語集解》引孔安國說所本。然則有無復字，兩本並行，亦未能必言孰是。復字有無亦未影響該章大旨，復字即相當於今語「再」字，存一復字，則語氣益重，懊喪更深，而契應「甚矣」、「久矣」之心情——即錢穆所謂之「感慨更深」。

（二）重言之辭氣

同語重複即重言之謂，先秦文字著於竹帛，不煩重之，當為存唇吻之原貌，《論語》云：

伯牛有疾。子問之，自牖執其手，曰：「亡之，命矣夫！斯人也，而有斯疾也！斯人也，而有斯疾也！」（〈雍也〉，頁52）

錢穆云：

孔子深惜其賢，故重言深歎之。²⁸

又，《論語》載：

蘧伯玉使人於孔子，孔子與之坐而問焉。曰：「夫子何為？」對曰：「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。」使者出。子曰：「使乎！使乎！」（〈憲問〉，頁128）

錢穆云：

繁，殊無可異，如於傳統文論中，劉勰之撰《文心雕龍》於故實亦博觀而慎資，是以與他人見解有同有異，而構為彥和一家之言。

27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，頁192。

28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，頁167。

不曰「欲無過」，而曰「欲寡過」，又曰「未能焉」，使者言愈卑，而其主之賢愈益彰；故孔子重言美歎之，曰：「使乎！使乎！」。²⁹

〈雍也〉與〈憲問〉所見重言，皆致歎語。句之短長不同外，前者重言其傷，對弟子染疫，深致感惜，後者重言以美，讚歎使者專對而達、拿捏得宜。《論語》重言之例常見，錢穆未一一敘之，茲列如次：

△子曰：「視其所以，觀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廋哉？人焉廋哉？」（〈為政〉，頁17）

△子在陳，曰：「歸與！歸與！吾黨之小子狂簡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！」（〈公冶長〉，頁45）

△子曰：「觚不觚，觚哉！觚哉！」（〈雍也〉，頁54）

△子見南子，子路不說。夫子矢之曰：「予所否者，天厭之！天厭之！」（〈雍也〉，頁55）

△顏淵死。子曰：「噫！天喪予！天喪予！」（〈先進〉，頁97）

亦有首尾重言之例，如：

子曰：「賢哉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。人不堪其憂，回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！」（〈雍也〉，頁53）

重言表露言說者強調之意態，於文本解讀，其功能雖屬輔助性質，卻非無意義。言說者之態度或輕或重或強或弱，正可自此體察。

（三）段落之辭氣

段落之辭氣，指自文本整體段落以把握言說者發語之特色或蘊涵。《論語》載：

²⁹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，頁426。



柳下惠為士師，三黜。人曰：「子未可以去乎？」曰：「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？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？」（〈微子〉，頁164）

錢穆云：

孟子稱柳下惠「聖之和」，觀此章，辭氣雍容，可謂和矣。然其不欲枉道之意，則確然有不可拔者。故孟子稱其「不以三公易其介」。惟玩其辭氣，終若視一世皆枉道，無可與為直；其惓惓救世之心則淡矣。故孟子又謂「柳下惠不恭」……。³⁰

錢穆此段話中，兩次語涉「辭氣」，前之「辭氣雍容」指柳下惠言辭間所流露之修養風致，後之「玩其辭氣」則謂讀者須體察潛隱於語言中之指涉，「焉往而不三黜」、「何必去父母之邦」云云為回應「子未可以去乎」之語，既意謂舉世枉道，故無所往而不三黜，又顯示其心之所繫在於魯國，而非天下。此須本諸段落以為推敲，始得見意。

又，《論語》載：

季文子三思而後行。子聞之，曰：「再，斯可矣。」（〈公冶長〉，頁45）

錢穆云：

此語有兩解。一說：言季文子惡能三思，苟能再思，斯可。一說：譏其每事不必三思，再思即已可，乃言季文子之多思為無足貴。……今就《左傳》所載季文子行事與其為人，及以本章之文理辭氣參之，當從後解為是。³¹

「三思而後行」乃時人稱季文子（季孫行父）語，孔子聞此而有「再，斯可矣」之言，錢穆所引前解，謂孔子未同意時人「三思」之形容，認為改以「再思」則差可；後者則並不質疑季文子之三思，第以其不必如此，再思已足。錢穆從後解，其所據，除《左傳》之記載，並參以本章之「文理辭氣」。然其於文理

30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，頁533。

31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，頁145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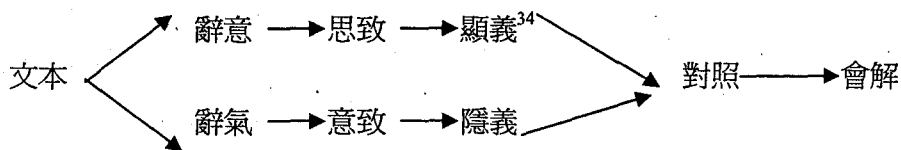


辭氣未加詳述，此試為補充。《論語》中，「斯可」四見：其一、〈公冶長〉本章所見；其二、〈述而〉之「聖人，吾不得而見之矣；得見君子者，斯可矣」；其三、〈子路〉之「子貢問曰：『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？』」；其四、〈顏淵〉之「子張問：『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？』」³²。「斯」；「可」二字若連用，斯字即承上啓下之判斷，相當於「則」，近於今語之「就」。四例之中，〈公冶長〉與〈述而〉皆繫語末助詞，而作「斯可矣」，有「就可以了」、「就行了」、「就夠了」之義。返諸季文子「三思而後行」之討論，若以此理解錢穆所舉第一說，則語勢不順，以此理解其第二說，敘述始暢，乃可知錢穆「文理辭氣」之實指。

錢穆《論語新解》所見辭氣之說，固不止於此節所論，本文僅舉其大端，以見其於文本辭氣之重視及其實際運用方式。錢穆曾云：「義理、考據、辭章，得其一，喪其二，不得謂能讀書。」³³若按此傳統三分法言之，文本辭氣之領會，當居於考據、義理與辭章三者之間，錢穆雖未曾專論《論語》辭氣於理解與詮釋之功用，亦未嘗逐一分析，然觀其大量運用之情況，參酌文本辭氣已然成為其解經之重要路數，而此適為當代經典詮釋所普遍忽略者。

四、由虛而實之辭氣體察

對文本辭氣之掌握乃傳統學者所重視與擅長之工夫，其不同於概念、思想之直接捕捉。一般而言，欲掌握文本中之大義，自以後者為便捷。苟欲完整捕捉說者之意態與言說之意趣，自須輔以辭氣之體會，一實一虛，相輔為用，而文本蘊涵乃能由平面而立體、自死板而靈活，其完整圖式可明如下：



32 分別見於《論語注疏》，頁45、63、118、110。

33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，頁128。

34 「顯義」於此，乃相對於辭氣之「隱義」而言；單就辭意論之，其亦可劃分顯、隱二義，前者為字面義，而後者為深層義。

古代於此之典範文本，於創作有曹雪芹之《紅樓夢》，於解讀則有金聖歎《天下才子必讀書》所為評點。理以知之，情以感之，則文本之蘊義可盡。

辭氣有廣、狹二義，就其狹義，主指虛詞、代詞——所謂「封閉性詞類」，馬建忠《馬氏文通》中即有此類剖析；就其廣義，則兼括文章修辭，此之修辭並不囿於中國傳統之修辭格，而為西方之「修辭」(rhetoric)概念，亦有譯之為「語藝」者。傳統學者緣其置身之語境及接受之訓練，無論就虛詞、代詞亦或語藝，敏感程度皆高於當代學者，唯亦常見一亟須突破之現象：其辭氣體會多呈印象式之表述，缺乏明確辨說，其中，有可予剖析而點到為止者，亦有得以體會而無法具體闡析者。因此，對某一文本之辭氣體會，其或是或謬，即難客觀論定，亦常出現諸家體會彼此抵牾之狀況。將經驗所累積之語感判斷充分客觀化，乃辭氣理解所宜致力者。錢鍾書《談藝錄》云：

余嘗病謝客山水詩，每以矜持矯揉之語，道蕭散逍遙之致，詞氣與詞意，苦相乖違。圓海況而愈下；聽其言則淡泊寧靜，得天機而造自然，觀其態則擠眉弄眼，齟齬折腰，通身不安詳自在。《詠懷堂詩》卷二〈園居詩〉刻意摹陶，第二首云：「悠然江上峰，無心入恬目」，顯仿陶〈飲酒〉第五首之「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。「悠然」不足，申之以「無心」猶不足，復益之以「恬目」，三累以明己之澄懷息慮而峰來獻狀。強聒不捨，自炫此中如鏡映水照，有應無情。「無心」何太饒舌，著痕跡而落言詮，為者敗之耳……³⁵

此論阮大鍼詩之文字後，實例分析猶多，文長不錄。從前引文可得二重點：一、「詞氣」與「詞意」為兩事，相互比對、推敲，真致乃現；二、錢鍾書不為虛泛之點撥，而以大量文本徵佐，非僅道其然，更明其所以然，遂可信從。具體分析自是探討辭氣之正辦，然如同言訓詁、論義理，時有異說紛陳而未可究詰之情況，唯力求具體說明，至少可備一說，以避免無的放矢。今可就《論語》舉一由對辭氣不同體會而致異解之例，《論語》云：

子貢方人。子曰：「賜也賢乎哉！夫我則不暇。」（〈憲問〉，頁128）

35 錢鍾書：《談藝錄》，收入《錢鍾書集》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01），下卷，頁500。

方，朱熹《集註》訓爲「比」，謂：「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」，並將「乎哉」解爲疑詞，又引謝良佐語，曰：「聖人責人，辭不近切而意已獨至如此。」³⁶錢穆同意「比方」之解，並謂：「方人若指謗人，孔子何以僅謂不暇，而又稱其賢？」錢穆將「賜也賢乎哉」下安一驚歎號，知其視「乎哉」爲歎詞，與朱熹視之爲「疑詞」者異，視爲疑詞則當繫問號，兩者輕重略別³⁷，然謝良佐所謂「辭不近切」之體會皆適用。然而，參以《論語》不同版本，「方」仍以作「謗」近是，義作「比方」者，見於《論語集解》引孔安國之訓，後皇侃《義疏》從之³⁸，然鄭玄作「謗」，而《三國志·王昶傳》載昶〈戒子書〉亦以「方人」爲毀惡之辭³⁹，此固非絕對證據，但其客觀依憑似勝於作「方」者。至於錢穆「何以僅謂不暇，而又稱其賢」之質疑，實不難解之，「謗」者即言彼不賢，故孔子以「賢乎哉」反詰，此非褒語，乃醒語，「夫我則不暇」之「不暇」相當於今語之「沒空」，意謂「我就沒空去說他人的不是」，所謂「沒空」，表示時間宜用於自我修養或其他實事。如此理解，通暢明順，措辭固如謝良佐所稱之「不近切」，細而體會，實爲重話。因知：辭氣之體會關係於版本、訓詁之認定，關鍵之實字常直接牽動辭氣之輕重。

五、結 論

辭氣之領會較辭意之理解爲空靈，若線索不足，解讀者之主觀涉入，自所難免，非有絕對證據，不必盡斥，實則文字一經讀誦，音節之輕重、緩急、剛柔、決疑之間，即已寄有誦讀者之詮釋。音樂家作曲、戲劇家編劇，他人取以表演，即不免兼含述、作，其理略通於布魯斯（Steve Bruce）所云：「用角色的語言來講，各個角色的腳本業已寫就，但演員在如何刻劃角色方面仍留有相當的自由。」⁴⁰探究辭氣亦然，索求正解之際，固須依據文本而力求「唯一」，若客觀線索不足，則守以「其一」，亦不必固具其聲而佯爲瘖啞。

36 朱熹：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217。

37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，頁429。

38 曾秀景：《論語古注輯考》，頁397。

39 參考陳舜政：《論語異文集釋》（臺北：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，1968），頁273。

40 布魯斯著，李康譯：《社會學》（香港：牛津大學出版社，1999），頁37。